主持人语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不同地区正在探寻各自的应对策略，也正在积累地方经验。为此，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以“多样性：环境与社会”为题在南京召开。为了明晰环境社会学学科特征，我们特别策划了该访谈，并用笔谈的形式展现。通过深入的半结构访谈，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同时也向人们展示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关注焦点等等特征。这组重点反映的只是大陆学者的部分成果。

四篇笔谈呈现了环境社会学者的最新思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洪大用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的角度探究了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几大重要议题，指出了学科发展所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趋势。南京大学的张玉林阐述了环境史对理解环境社会学具有不可或缺性，建议在开展环境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时要关注中国特定社会的环境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毅试图整体地和历史地去研究环境问题背后“难缠”的社会因素，将环境问题放回到社会生活中去、将环境变化视为社会变迁的一个部分去理解。并就此展开讨论。河海大学的陈阿江以自身多年实地研究经验，探讨了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双重特征：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

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国际性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00872

从学科角度讲，环境社会学大概有以下三种涵义：一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二是企图颠覆传统社会学甚至广义上包括社会科学的环境社会学，强调研究环境约束下的社会；三是强调研究环境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交叉所形成的环境–社会复合系统。可以说，以上三种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都有体现。最近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正视并主动有效地回应挑战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健康发展，是学科共同体的重要责任。

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与挑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没有学科意识的自发阶段。在此阶段，虽然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已经展开，但当时学科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应该说是不存在的。此后，特别是 2000 年以来，具有学科意识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逐步得到强化。应该说，2007 年[1]是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此后不仅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学科建设也采取了很多具体行动。

首先，组织机构和研究平台建设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一方面，我们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环境

[1]2007 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环境社会学的特殊性与环境史

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10093

环境社会学:面对的问题与学养要求

任何一个学科可能都有其特殊性,也即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自的研究对象和把握方式。虽然没有了特殊性就意味着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本文强调环境社会学的特殊性,并不是为了说明其存在的理由,而是要突出这门学科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它所需要的知识的宽度和厚度。这涉及它与传统社会学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不同。

环境社会学固然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但是它的研究对象与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很大差别。我们知道,自 19 世纪诞生以来到 20 世纪中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社会",它包括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等,但并不包括自然,或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排除了"环境",至多只是把环境当做一个给定的、而且往往是不变的社会条件或背景。与此相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却触及更广,不管是将其界定为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还是环境问题中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于整体上将它看做"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都超出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它同时涵盖了"环境和社会"。这简直是"以小吃大",虽然看上去显得矛盾。这也意味着,"环境社会学"的成立,主要是建立在"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层面的表述,至于它的研究范围和相应的综合性,是超过其母体学科的。

那么,研究对象的这种差别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环境社会学的第二个特殊性:除了要采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之外,还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视角。更确切地说,不只是理论、方法和视角,而是超越了理论、方法和视角的更为深厚的学养。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研究者都要具备所在学科所要求的相应的学养,否则只能扮演南郭先生。但是每个学科的学养要求并不一样,在知识结构、知识的宽度和厚度方面有很大差异,自然科学家可以非常"专业",而社会科学家就必须达到"知识渊博"的程度。就环境社会学而言,由于它面对的是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环境问题"又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涉及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这两个都异常复杂的巨系统,包含了太多的要素或变量,因此对研究者的学养要求也就比社会学以及其他分支社会学的要求更高。比如,研究阶层、组织、宗教等问题,未必需要生态学、环境学的知识,也未必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但环境社会学却不仅需要将生态学、环境学列为必修科目或需要补课的科目,而且在面对具体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时,还要充分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以把握仅凭感官和"参与观察"难以感知到的河流、土壤的污染程度,了解相应的污染要素和污染机制、连锁效应,然后才能进入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再比如,在面对整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需要了解"生态足迹"的概念以及相关的研究结论,以便更为切实地、而不是空泛地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与社会：一个“难缠”的问题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100732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当政府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试图揭示环境问题成因的时候，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被高度重视，而社会成因却被简单化，在许多时候环境政策甚至建立在对社会成因的猜想和自以为是的假说上面。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环境问题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需要整体和历史的思考才能加以把握。

环境如何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也许没有人否认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但是在许多人看来，社会问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的高深研究不同，社会科学的结论似乎是有目共睹的，无需深入的研究就可以为大家所知道。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荒漠化问题，现在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受到荒漠化的威胁。草原退化是荒漠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占国土面积 40%的草原有 90%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已经有大量研究，如草原退化与气候变化、与草原利用强度和利用方式之间的关系。仅大范围确定牧草产量，就要将遥感和地面监测的结合，产生大量科学数据，人们依赖这些数据来判断草原退化的现状。但是草原退化的社会原因，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解释，比如人口压力增加、过度放牧和“公地悲剧”等等，似乎每个人甚至不需要去草原，就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人们接受这些解释不是因为这些解释有证据，而是因为他们与人们的想象经常是一致的。因此在面对草原退化的时候，似乎不仅不需要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甚至不需要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人，凭着经验和直觉就可以清楚地表述其社会原因。

或许大量的政策就是基于这种简单化的社会归因形成的，包括减人、减畜等草原保护措施纷纷出台。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达到草原保护的目的，反而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是很少有决策者认识到面对环境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反而基于一些自以为是的常识，如补贴不足、管理不严等，进一步强化原有的政策。其结果经常与保护环境的目的南辕北辙，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这些政策之所以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思考环境问题的时候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忽视了环境社会学所面对的是一个“难缠”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呢？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将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梳理清楚呢？换句话说，环境社会学要怎样去研究呢？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需要透过环境现象的外表才能深入认识其社会原因。

科学关注因果关系，不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强调分析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即使在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

陈阿江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210098

费孝通在晚年谈到社会学学科性质时，认为社会学兼具“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但他同时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此外，社会学科研教学本身就是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1]作为社会学分支的环境社会学，无疑也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由于环境社会学分支自身的特征，结合笔者的研究经历，下面我将着重从环境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中国传统”两方面展开探讨。

科学性

由于环境社会学研究离不开“环境”这一物质形态的对象，且研究议题又涉及很多科学技术问题，因此环境社会学科学性的特征比起其他分支学科就显得更为突出，具体地说：环境社会学的科学性问题，首先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尽管其它学科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从差异性的角度看，环境社会学可能更加明显。其次是科学知识，环境社会学研究时可能需要更多地了解科学技术层面的知识，虽然有时是作为常识来使用的，但准确地理解科学技术问题往往是深入研究环境之社会学议题的前提条件。第三个是科学的方法、手段或设备上，要与时俱进。

先说科学态度或科学精神的问题。近两年来，我们在做太湖流域、巢湖流域的面源污染问题。这个题目很难做，原因是自然科学的研究目前也说的不是很清楚。针对这一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可以做个看起来很“科学”的问卷调查，似乎也可以有很丰富的数据，但如果这样做，很难真正达到准确认知的要求。所以，我们反复地去现场，请农户对化肥、农药的实际使用过程进行记录；购买仪器来测量水质等等。之所以这样耗时、耗力，不辞辛苦，主要是想最大限度地了解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情况，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科学态度在支撑着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理解社会，去研究社会学的成果，当然，对物质状态的了解，跟我们对社会事实的判断和解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把科学这一问题忽略掉了，在环境社会学里恐怕很难有突破。我们做“癌症村”研究在淮河流域调查时，多方走访，探

[1]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